

先秦时期民生思想的特征与当代价值

唐任伍 刘立潇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以各派学说为基础,提出了一系列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的民生思想。先秦诸子的民生思想在“节用”、“公平正义”、“仁爱”等方面有许多契合之处,然诸子百家的民生思想亦有各自的特征,儒家倡导“以民为本”和“富民惠民”,道家民生思想最根本在于“无为而治”,法家民生思想根本在于建立法制,通过实施法制推动民生发展,墨家民生思想的特征则在于提倡“兼相爱”、“交相利”和“非攻”。虽然先秦民生思想的时代背景与今天社会主义中国迥异,但对今天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动民生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关键词】先秦;民生思想;特征;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F0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410(2013)06-0024-06

古人对于“民生”概念的起源可追溯至上古时代,自伏羲桑麻织锦、制作衣物,燧人氏钻木取火、教人不再茹毛饮血,大禹离家治水、免除百姓颠沛流离时,民生关怀就初步建立了。“民生”一词最早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一书中的“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意为解决国民生计问题首在勤勉,通过让国民勤劳耕作,物质财富就不会匮乏,生计问题即得到解决。“民生”一词传承至今,其内涵和外延得到古今中外无数学者的发展和拓展,涉及与人民生计相关的各个方面。在笔者参与编著的《2012中国民生发展报告》中,就将“民生”定义为基本生活需求、尊严和关爱^[1],本文也认为“民生”涵盖收入与就业、居住与出行、安全与健康、文化与健康几个维度,^[2]凡属此类领域的皆是民生研究范围。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相继涌现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派和学者,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中第一个盛世,而中国民生思想也在这个时期逐渐成形,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儒、道、墨、法等学派都表达了相当的民生关切,提出大量民生主张,这些学派的民生思想共同推动中国民生思想的第一次历史沉淀。今人要继续推动中国民生发展,更好地解决

民生问题,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生思想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本文致力于梳理先秦诸学派民生思想的异同,比较诸子民生思想的特征,总结诸类民生思想潮流的当代价值,为我们当今保障、改善民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益启示。

一、先秦诸子民生思想契合之处

先秦时代以孔孟、老庄等人为代表的诸子学派分别在民生思想方面提出了许多意义深远的民生主张,如儒家提出“制民之产”,道家提出统治者当以“百姓心为心”,法家认为要大力奖励农耕,墨家提倡“交相利”。诸学派民生思想不尽相同,他们的研究侧重于不同方面的民生问题,然在节用、仁爱、公平正义等民生思想上亦有不少契合之处。

(一)“节用”的民生主张

先秦诸子提出节用,意指节约不必要的物力,杜绝奢侈浪费;考虑民众对徭役的承受能力,勿使民力透支。

儒家的节用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统治阶级治理国家过程中节约财力、民力,如《礼记·祭法》曰:“断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而《论语·学而》所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

【作者简介】唐任伍(1954—),男,湖南邵阳人,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经济思想史、全球化与政府效率。

人,使民以时”,成为历代君王理政的主臬;孟子也主张使用民力时,需注意“不违农时”;荀子亦言“罕兴力役,无夺农时”(《荀子·富国篇》)。说明儒家学者都是要求统治者需要根据农业生产客观规律安排民众徭役,不能与农时相违背,妨碍农业生产,致使民力透支。二是《论语·学而》有云:“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奢侈豪华就显得骄横,节俭朴素就显得寒酸。与其骄横,还不如节俭的好,要求个人生活方面应当尽量节俭。古代中国以农立国,儒家重农的节用思想对后世有重要影响。

墨家主张节俭生活,反对奢侈享受,所以“节用”是其主要思想之一。墨子云:“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作敛于民众,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也”。并将君王不惜民力奢侈浪费视为治国的祸患之一,“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三患也(《墨子·辞过》)。”相应地,他认为会用则生、节用则存,他倡导统治阶级“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墨子·节用中》)。君王如能去其无用之费,即可降低国家财政支出,有益于增进民众福祉,减少横征暴敛。为此,墨子针对当时厚葬和君王奢侈享受制订了一系列节用的细则,要求君王短丧薄葬,取消乐、舞等享乐活动。

道家对“节用”民生思想的重视程度为先秦诸学派之最,体现在节欲式的崇俭抑奢,老子曰“我恒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第六十七章》)。俭即是节用,老子有言:“俭,故能广”,他不仅如墨子般要求杜绝浪费,更是要求对人的欲望实施有效控制,他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第十二章》)。普通民众不应当放纵个人欲望,当权者更是要“塞其兑,闭其门”(《老子·第五十六章》),要“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第十九章》)。

(二)“扶弱”的民生主张

中华民族历来体恤、同情弱者的民生逻辑可说是极大地受到先秦诸子的影响,儒家特别重视对老幼等弱势群体的民生关怀,将老幼生活保障水平作

为衡量民生发展程度的一则标准,墨家的仁义民生思想亦是崇尚帮助弱者,以向弱者传递“仁”作为墨者行动目的。

孟子曰“老而无妻曰嫠,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如果能够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治长》),社会上老者能够颐养天年,壮者有真诚的朋友相互提携,年幼者得到温暖、适宜的成长环境,则为理想的“仁政”局面。在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编撰的《礼记·礼运》篇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并且,儒家认为遇到严重的灾荒时,统治者应当积极赈灾,救济受灾民众,如果“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九君之仓廩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孟子·梁惠王下》)。这说明关爱弱者是儒家民生思想的重要一节。

与儒家关爱弱者的方式相比,墨家也特别注重帮扶弱势群体,不同则是其倡导的倾向于侠义道式的急公好义,认同乐善好施、兼济众人的行为选择。《墨子·尚贤下》有云:“为贤之道,将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即接近于侠义道中有难相助、有困相济的义气;《墨子·兼爱中》载:“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墨子·鲁问》载:“财多,财以分贫也”,就是要求每人发挥所长,从物力、财力各方面帮助需要帮助之人,如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墨子·尚贤下》)。

(三)“公正”的民生主张

先秦诸子的民生思想都包含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愿望,道家表现为老子提倡的“以正治国”,法家表现为“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式的法律平等,儒家则表现为追求均贫富的愿景。老子秉持正义治国的民生思想,提出“天道正义民生观”,他认为“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3](《老子·第七十七章》)。他将天道比作弓弦,如果想把弓调好,就应该把装高的弦弄低,把装低的弦提高,把多余的弦去掉,把不足的弦

补上,这样的天道才是公正的。因此,“以正治国”是建立秩序社会,实现“道”的必然选择,统治者必须要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实现公平正义,才能“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史记·货殖列传》)。

法家尤其注重推动实现公平正义,因为法家遵循“依法理政”的治国方式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律法公平,如若不能实现法律的基本公正,法治就不能实现。法家将法令作为衡量民众行为的标准,合则大力激赏,不合则重罚,刑不分贵贱,功不能抵罪,要求在律法面前人人平等,如商鞅在秦国就对触法的太子嬴驷和公子嬴虔实施了严厉制裁,可见法家倡导的公平正义是通过法律公平来实现的。

儒家在社会公平正义方面,侧重于“均贫富”。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孔子认为社会贫富差距过大,不仅民众基本生计难以保障,也危及当权者的统治基础,所以要尽量缩小贫富差距,防止两极分化。汉武帝时期学者董仲舒:“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匮而上下相安”(《春秋繁露·度制》)。说明儒家要求以协调贫富来保持一定程度的社会公平。

(四)“仁爱”的民生主张

先秦时期诸侯之间战争频繁,民众多因战祸颠沛流离,受战争影响生活困顿,诸先秦学者多对此非常关注,因此“爱民”是先秦儒道法墨诸家的共同民生主张。

老子认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第四十九章》),“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第二十五章》)。要求统治者爱民重民,以民众意愿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依据;孔子将“仁爱”释作“爱人”,他认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体现为要求统治者推己及人、博爱众生。墨家的仁爱体现为要求统治阶级轻徭薄赋,如“役,修其城郭,则民劳而不伤;以其常正,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墨子·辞过》)统治者按照通常规定的劳役修筑城郭,人民虽然劳累,但不伤大体,按照通常的征税原则收取租税,人民交

纳了但不感到税赋重。

二、儒家民生思想特征:民本与富民

先秦民生思想中,对后世统治者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民生思想。儒家基本上坚持自上而下的“权威主导型”民生观,^[3]在政治、经济、社会等角度提出了一系列民生发展的建议,虽然孔孟民生主张仍具有较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但他们倡导的诸如“民贵君轻”、“以民为本”等思想对统治者的治理逻辑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民生思想中,明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莫过于“民本”和“富民”民生观。

(一)民本

儒家的民生观强化政治道德关怀,民本理念是儒家民生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如学者钟金雁就指出:“儒家治国理政以民为本,以民为本,其实就是以民生为重。”^[4]儒家认为人民是政权和君王统治地位得以存续的基础,百姓拥戴则政兴人旺;若是百姓离心,任何坚固的政权和强大的君王统治都将土崩瓦解。孟子将此民生观概括为:“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民生是保障国家政权继续运转的基石,所以对待百姓,应当遵循“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的民生选择。战国后期,儒家荀子进一步拔高“民本观”的重要性,他指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得民心者可得天下,失民心者必身败。

(二)富民

儒家民生思想中的“富民惠民”主张是儒家经济民生思想的首要特征。

儒家提出“富民惠民”主要通过设计经济制度和政策,解决百姓生计问题达到预期目的。在生产领域,孟子首倡“恒产论”,认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所以要通过保障民众得以按农时耕作土地,发展农业生产创造基本的生活生产资料。依据孟子的生产规划,“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孟子·滕文公上》),即建立

公平、均等的井田制度,争取“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如此不仅解决民计问题,“王道”也能够实现。

三、道家民生思想特征:无为

道家代表人物老庄身处春秋战国乱世,有感于各诸侯国动辄发动战争,民众累于税赋和徭役之苦,故为矫时弊,以纾民困,提出政府应当顺应自然的治理逻辑,所以“无为”是道家民生思想的最高准则和突出特征。

“无为而为”是先秦道家民生思想的起源。老子指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老子·第七十五章》)。民生问题实际是由于统治者苛捐杂税的掠夺行为引起的。庄子的观点更为尖锐,他认为圣人的危害与大盗无益,批判圣人、诸侯君王实际是社会中危害最大的盗。因此,道家认为“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第五章》),反对统治者任意妄为,主张百姓要像宇宙万物一样自然、安逸地生活,要效法天地,按照万物的本性来治理国家,摈弃先秦其他学派提出的仁义和是非观念,反对仁义治国和以法治国。老庄认为统治者不要扰乱自然规律,顺应“无为而治”的逻辑,做到“以正治国”,则可“无为而无不为”,否则将“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张,盗贼多有”(《老子·第五十七章》)。

相应地,道家指出要达到“无为”境界,君王和民众都要压制个人私欲,应当“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老子·第四十八章》),追求无欲的精神境界。如果执政者注重节俭,就不会搜刮榨取、残民自肥,国家则会长治久安。“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并由“无欲”的主张引出道家的知足观:“故知足则常足矣”,如此则可达到“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音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老子·第九章》)这样的道家理想社会。

四、法家民生思想特征:法制

法家学说与儒家一样,是先秦已降历朝历代统治者运用最多的,封建统治者无不以儒家理论教化民众之精神,而运用法家理论管制民众之行为。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在秦实行变法,打下了秦国统一中国的基础,并切实推动了秦国民生发展。毛泽东就曾论述过商鞅“富民”的政策,“商鞅之法,良法也,……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5]同时,法家倡导践行的法制观念也是当今推动建立法制社会的重要借鉴,所以研究先秦民生思想则不可不涉及法家,法家民生思想的特点主要是制订律法来达到富民目的。

(一)建立法制

法家秉承为民、治民、立民为核心的民生法制观,主张建立法制帝国,如商鞅曰:“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商君书·定分》)。对于如何管理民众,最好的方式就是制订合理的法律,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进而让民众能够安于生产生活,如此则政权安宁、百姓富庶。他说“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生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有乱。当此之时,民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故贤者立中,设无私,而民曰仁。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凡仁者以爱利为道,而贤者以相出为务。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商君书·开塞》)。

法家农战、富民等民生发展的政策都是通过法制来推动的,因而建立法制是法家民生思想的首要特征。

(二)法制富民

法家通过法制富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取民有度”的法制富民观点。管仲认为对于管理百姓,要“足其所欲,瞻其所愿,则能用之耳”(《管子·侈靡》),唯有如百姓有土地耕作,民众才会安于接受君王的统治。同时,提高民众基本素质,也要在富民后方可实现,此所谓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因此,管仲任齐相时,特别制

订了一系列规范土地分配、商贸发展的律法和政策,鼓励百姓发展生产,并且政府也应当“取于民有度”,“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国虽大必危”(《管子·权修》)。统治者盘剥人民收益要限定在合理“度”之内。

管仲的法制富民思想还主张富者不得无限扩张财富,不得过度兼并土地,以致贫富差距过大。管仲认为“夫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管子·国蓄》),如果不能满足贫者温饱要求,则更难以实现“知荣辱”、“知礼节”了。所以管仲主张政府关注财富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实施调控,避免贫富悬殊。

二是以农为本的法制富民观点。先秦法家都以农为本,农战是法家重要支柱思想。管仲认为,刻镂文巧、珠玉财货等工商技艺属于无用之物,可能导致社会风气趋于奢侈,无益国家富强。而农业生产则关系国贫国富的根本,是百姓生存的基本保证。“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管子·治国》)。国家经济实力和民众生活水平取决于农业生产是否发达,农业生产是王道延续和民众生存的根本。

战国时期,商鞅学派也是坚持实行重农轻商政策,鼓励耕织,著《农战》曰:“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商君书·农战》)。应当说,商鞅提出的以农为本、实行农战不仅是增强国家实力的举措,也是他通过法制富民,推动民生发展的实践。

五、墨家民生思想特征:兼爱与非攻

墨家在先秦百家中独树一帜,墨家对墨者提出体验苦行僧式的节俭生活,对百姓则以其悲天悯人的民生逻辑提倡“兼爱”、“交相利”、“非攻”为特征的民生关怀。

(一)兼爱

“兼相爱”是以人性之“爱”为核心的民生伦理思想,是墨家民生思想的根本特征。墨子深刻体察到民间疾苦,认为普通民众是社会灾难的主要承担着,最需要被关爱和照拂,进而指出,只有推行

“兼爱”才能做到人人互利互爱。其“兼爱”思想包含三层涵义。

一是墨子指出不兴“兼爱”,就会引起多种社会矛盾。“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墨子·兼爱》)。民众之所以受战祸、自然灾害而生活困苦,皆由于缺乏这种普世价值的“博爱”民生关怀。

二是墨子提倡的民生平等观。墨子视不同阶层的人民为一体,不论权贵或贱民,人人皆生而平等,都是上苍赋予个人的不可剥夺之权利。即倡导人人都有平等的生存生活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冲破统治者制定的等级限制的积极作用。譬如保障了社会底层民众的生存等权利,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平等意识的起源。

三是墨子的“交相利”民生思想。墨子倡导的“兼爱”并非一种单方面付出的关爱,“兼爱”是人与人之间互爱,“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只有人人互爱,才能实现共赢局面。墨子进一步指出,“互爱”即是“互利”,“爱人”即是“利人”,“兼相爱”即是“交相利”,倡导互利互爱,协作共赢的民生关怀。譬如为官者造福于民,为民者积极响应税赋徭役,各阶层人民各尽所能关爱他人,让利于他人,“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就能构建“兼爱”的理想世界。

(二)非攻

墨子提倡“非攻”的战争民生思想,其逻辑起点仍是普通民众生计问题。墨子曰:“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饿而死者,不可胜数。今尝计军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拔劫,往而靡毙臃冷不反者,不可胜数;又与矛戟戈剑乘车,其列住碎折靡毙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牛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涂道之修远,粮食辍绝而不继,百姓死者,

不可胜数也；与其居处之不安，食饭之不时，饥饱之不节，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墨子·非攻》）。这体现了一种人道主义精神和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因此毛泽东称赞墨子“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

墨子指出：“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之而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若知其不义也，夫奚说书其不义，以遗后世哉？（《墨子·非攻上》）”意为杀死一人称为不义，必有一条死罪，按此推论，杀死十人必有十倍不义和十条死罪，杀死百人必有百倍不义和百条死罪，对此，天下的仁人君子都明白这个道理，现在有人大行不义，讨伐别国，却不去反对此事，反而称之为义，实在是不知道这就是不义啊。换言之，墨子认为发动战争，进攻他国是为不义，主张避免一切战争。

墨子奔走于各诸侯国，游说君王停止发动战争，史载墨子自鲁国出发，用十天时间赶至郢城，游说楚王勿攻打宋国，楚王为墨子说服，被迫中止战争。当然，如冯友兰先生所说：“墨翟反对兼并战争，但他不是简单的和平主义者；他只主张非攻。而不主张非战。他反对攻，却讲究守。他不主张‘去兵’，而主张备兵，主张备兵自守……墨翟一般地反对进攻，主张自卫。但以攻守为标准仍然不能区分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6]墨子精通冷兵器时代的机械和兵器制造技术，熟悉战争中各种攻城略地的技巧，他率领众墨者帮助多个被攻打诸侯国进行防御战争，企图击退进攻者而中止战争，以此践行“非攻”的战争民生思想。

五、先秦民生思想对当今民生发展的启示

先秦诸子民生思想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对历代王朝政权建设和民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儒家的平民教育民生思想，道家的节用民生思想，法家的法制民生思想，墨家的兼爱民生思想，无不对后世治理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诸子对于这些民生思想的论述使君王意识到，“如果不解决好民生问题，或对资源的掠取超过民众的生存界限，那

么它可能导致严重的统治危机”，^[7]促使统治者关注民心向背，改善民生状况。当然，先秦诸子的民生思想具有较强的理想主义色彩，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环境，民生的具体准则、表现形态会有所不同，部分先秦民生思想明显脱节于当今社会主义中国的具体国情。但是古今民生问题具有一定的连贯性，今天我们要推动社会主义中国的民生发展和民生思想建设，也不可能摒弃古人民生思想的精华，先秦民生思想中部分基本精神于当今保障和改善民生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先秦民生思想对当今民生建设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富民是民生的基础，强调当今民生发展的首要任务仍在于如何使民众富庶，只有民富才能本固邦宁。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制订合理的法律法规，推动政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解决民众问题，如温饱医疗、教育、住房等民生问题。二是公平正义是民生的保障，强调民生发展不仅要追求速度，更要注重发展成果的公平性，借鉴儒家“均富”民生思想合理化收入分配格局，法家“法制”民生思想推动法律公正、制度公正。三是关爱弱势群体是民生发展的重要一环，强调民生发展要重点扶持弱势群体，扬弃墨家“兼爱”民生思想，宣扬“仁爱”的普世价值，彰显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1][2]唐任伍. 2012 中国民生发展报告[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20, 25.

[3]于慧颖. 先秦民生思想研究[J]. 史学集刊, 2011 (03): 55.

[4]钟金雁. 儒家民生思想探析——以孔孟为核心[A]. 孔学研究(第十五辑)——云南孔子学术研究会第十五次暨海峡两岸第八次孔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云南, 2008: 99.

[5]毛泽东. 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 6 - 1920. 11)[M]. 湖南: 湖南出版社: 1990: 1 - 2.

[6]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19 - 220.

[7]中恒胜, 王玲. 民生国家: 现代国家建构的一个重要维度[J]. 理论与政策, 2007, (03): 12 - 13.

(责任编辑: 周杰)